

管理学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4 年第 2 期

目 录

研究文章

精益创业过程中企业与用户的价值共创机理

——基于互动视角的探索性单案例研究 张敬伟 田小圆 何周丽 (1)

数字效果推理：多维结构、测量与创业绩效影响验证 杨 杰 汪 涛 (25)

(“高质量创业的生成与成长机制：创新驱动与国际比较”特刊投稿)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债务融资成本影响研究

——基于三元风险理论模型的视角 刘 鑫 党莉莉 郭小曼 (50)

权、财是“放”还是“收”？

——传承背景下家族企业创新中的父爱纠葛 吴 炯 黄钧瑶 (86)

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地区创业活动 宋子杰 黄乐维 朱 沅 (111)

企业责任式创新：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 蒋 璐 孙栩锐 卢 超 于晓宇 戎 珂 (137)

Contents

Mechanisms of Value Co-cre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Users in the Lean Startup Process

—An Exploratory Single Case Study Based on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Jingwei Zhang Xiaoyuan Tian Zhouli He (1)

Digital Effectuation: The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Measurement and Verification the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Jie Yang Tao Wang (25)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Debt Financing Costs

—A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Tripartite Risk Theory Model Xin Liu Lili Dang Xiaoman Guo (50)

Whether Power and Wealth Should be “Released” or “Retained” ? : The Paternal Entanglement in

Innovation of Family Firms under the Context of Succession Jiong Wu Junyao Huang (86)

Synchron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Zijie Song Lewei Huang Hang Zhu (111)

Corporate Responsible Innov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Lu Jiang Xurui Sun Chao Lu Xiaoyu Yu Ke Rong (137)

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地区创业活动^{*}

□ 宋子杰 黄乐维 朱 沅

领域编辑推荐语:

“本文基于中国情境揭示并验证了制度同步性影响地区创业活动水平的成本效应和机会效应,启发未来研究从量到质、从水平到结构展开新的探索,为这一话题的研究打开了重要窗口。”

——杨俊

摘 要: 制度并非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由不同制度维度共同构成的复杂体系。因此,制度发展不仅体现在制度整体层面,也反映在不同制度维度的演进。本文综合考虑制度发展同步性(各项制度维度之发展速度的一致程度)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分析其如何共同作用于地区创业活动。本文认为,不同步的制度发展进程既会产生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创业的成本(成本效应),亦能创造制度套利空间,产生创业机会(机会效应)。基于此,本文认为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地区创业活动之间存在“U”形关系。同时,若该地区的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低或未来导向程度较高,则制度发展不同步产生的负面影响会更弱,创业者能够更积极地利用涌现出来的创业机会。本文构建出覆盖我国280个城市的市级层面数据集(2004~2019年),并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支持了相关假设。上述发现从创业机会角度丰富了对于制度发展同步性的认识,并指出制度发展同步性是影响地区创业活动的重要制度因素。

关键词: 制度发展同步性;多元制度观;动态制度视角;地区创业活动

一、引言

制度(Institution)如何影响商业活动是制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Autio & Acs, 2010; Bruton et al., 2010; 樊纲等, 2011; Boudreaux & Nikolaev, 2019; 贺小刚等, 2019)。近年来,制度研究逐渐走出了单一、静态的视角,开始关注制度的多元性和动态性(Banalieva et al., 2015; Fuentelsaz et al., 2022)。然而,正式制度的演进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动态、复杂制度环境下的创业活动研究”(71872193)和“双重认知能力与制度环境互动的创新性创业生成机制研究”(72272063)的资助。感谢编委、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感谢叶文平老师、王博老师、梁雪姬老师以及陈雁莹、陈心雅、刘映彤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文责自负。

并非仅仅涉及整体速度的快慢,还包括不同维度之间的协调与同步。制度发展同步性较低表现为在一个制度体系中,同时存在变化速度相对较快和相对较慢的子制度维度。基于制度复杂性理论,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在制度发展同步性较低的环境中,经济主体往往面临严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Shi et al., 2017; Chan & Du, 2021; Li et al., 2022),并承担额外成本(Peng et al., 2008),更难开展经营活动。然而,在部分转型经济体国家,即便其正式制度尚不完善、制度发展进程呈现明显的不同步特征,商业活动(特别是创业活动)却为何能进行得如火如荼?

新近的制度理论文献指出,不同制度维度之间的逻辑差异能产生制度套利(Institutional Arbitrage)空间,行动者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套利机会来获取收益(Perkmann et al., 2022)。然而,现有探讨制度影响商业活动的研究却忽视了制度发展不同步的这种潜在积极效应。我们认为,这种理论空白之所以会出现,部分是因为相关研究更多地关注成熟企业的运营,故而更多地观察到制度发展不同步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额外成本。如若从创业的视角来看,则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创业意味着对新机会和新模式的识别和开发,而各制度维度之间不同步的发展状态可能导致市场上出现未被满足的需求,这为敏锐的创业者提供了在不同制度维度之间进行制度套利的机会。因此,创业情境可能有助于整合两种理论观点,并丰富制度发展同步性的理论内涵。基于此,本文尝试引入制度套利的观点,分析制度发展同步性的机会效应,并探讨制度发展同步性如何影响地区创业活动。

本文认为,制度发展同步性对创业活动同时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制度发展不同步会增加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产生额外的成本,阻碍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成本效应);另一方面,不同步的制度发展进程也会产生制度套利空间,随之涌现出有潜力的创业机会,吸引创业者利用套利机会进行创业(机会效应)。上述两种效应共同作用,使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创业活动之间呈现出“U”形关系。本文使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供的新增企业数量测度地区创业活动,并结合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分省份市场化指数等数据,构建出2004~2019年包含280个城市的新增企业的市级层面数据集,以全景式地展现我国各地区的创业情况。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统计检验。

本文具有以下潜在贡献。首先,本文指出,不同步的制度发展进程既会产生高昂的成本,也能创造机会,完善了对制度发展同步性之作用的认识。当前有关制度发展同步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不同步的制度发展进程有何负面影响(Chan & Du, 2021; Shi et al., 2017),忽视了其潜在的机会效应,本文利用制度套利的视角揭示其积极作用。其次,本文采用动态多维的视角考察制度环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并提出了制度发展同步性会如何影响创业活动的理论逻辑,有助于深化对制度影响创业的认识。虽然多元制度观和动态制度视角均已被引入创业领域(Ault & Spicer, 2020; 王博和朱沆, 2020),但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不同子制度维度变化速度不一的现实。本文在此基础上探讨正式制度不同维度发展同

步性对创业活动的作用，丰富了制度影响创业的文献。最后，本文将不确定性规避和未来导向两个文化因素引入理论讨论，观察它们与制度发展同步性对创业活动的共同作用效果，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正式制度作用效果差异的理解。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明确核心概念的定义及其与现有研究的关系，并对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地区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详细说明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测量，以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第四部分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并主要对稳健性检验进行说明；第五部分是结论与讨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背景

制度是一系列人为设定的、约束人们互动关系的规则（North，1990）。本文根据“制度维度”和“制度变化”两个方面将现有制度视角下的创业研究划分为如表 1 所示的四种类别。其中，单一静态制度视角的创业研究主要关注制度发展水平。例如，相关研究认为，更高的市场化水平能够让创业者更快了解市场供给缺口，发现创业机会，从而使高市场化地区的创业活动更活跃（Dau & Cuervo - Cazurra，2014；Chowdhury et al.，2019）。在此基础上，多元静态制度视角的创业研究将多种制度同时纳入考察范围，关注多元制度产生的复杂影响（Ault & Spicer，2022；谢智敏等，2022）。研究认为，活跃的创业活动离不开各制度维度之间的相互匹配（杜运周等，2020）。然而，制度环境不仅包含一系列静态的

制度水平，还包含动态的制度变迁过程（North，1990），上述研究视角并没有对制度的动态变化如何影响创业活动给予足够的关注。一部分学者发现了这一理论空白，并开展了尝试。例如，王博和朱沆（2020）的研究发现，过快的制度变迁会增加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令企业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制度规则（Xu & Meyer，2013）。但是，动态制度视角下的创业研究仍将正式制度视为一个统一的、步调一致的整体，未能体现出制度的多元性特征及其子制度维度之间的互动效应。

表 1 制度视角下的创业研究分类

制度维度 制度变化	单一	多元
静态	制度发展水平 (Dau & Cuervo - Cazurra, 2014; Chowdhury et al., 2019)	制度多样性 (Ault & Spicer, 2020; 杜运周等, 2020)
动态	制度发展速度 (王博和朱沆, 2020)	制度发展同步性 (Shi et al., 2017; Chan & Du, 2021)

有关制度发展同步性的分析视角综合了上述研究的观点，并同时考虑了制度的多元性和动态性特征。Shi 等（2017）在其开创性研究中率先关注到制度的这一特征，并将多元制度观与动态制度视角有机结合，提出了“制度脆弱性”（Institutional Fragility）这一概念，用来描述不同制度维度发展速度的不一致程度。基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样本数据，他们研究发现，较高的制度脆弱性会导致制度内部出现摩擦和冲突，从而增加企业在该制度环境下运营的难度，迫使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以规避不利的制度环境，而生产率高、拥有国有背景的企业

更容易应对这种制度环境。Chan 和 Du (2021) 在此基础上将制度脆弱性与制度发展速度、制度不可预测性等重要制度变量做了进一步区分,并在分析中把它概念化为“制度发展同步性”(Synchronization of Pro-Market Reforms)。研究发现,新兴经济体发展不同步的制度环境对外国子公司的经营绩效会产生负面影响,而在本地的关系网络则有助于企业应对这种不利的制度环境。

本文认为,相较于“制度脆弱性”,“制度发展同步性”能更好地体现该制度变量的内涵,也更贴合其操作定义,因此我们最终选择使用“制度发展同步性”来描述该概念。通过梳理与该制度变量相关的文献,我们发现,过往研究主要关注制度发展不同步对成熟企业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同时聚焦于成熟企业的应对策略。具体而言,现有研究认为,制度发展的不同步性会增加制度环境的复杂性,提高成熟企业所面临的经营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然而,对成熟企业的集中关注可能令现有研究忽视了制度发展不同步的潜在积极效应。成熟企业更关心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运行效率,而创业活动的核心在于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Shane & Venkataraman, 2000)。创业者通常对环境中的机会有更高的警觉性(Sine & David, 2003),能够敏锐地识别出由于制度发展不同步而涌现出来的创业机会并采取行动。因此,制度发展不同步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可能与其对成熟企业的作用存在差异。

同时,相较于成熟经济体,制度发展同步性问题可能在转型经济体国家的市场化过程中更加凸显。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遵循了先易后难、

逐步推进的思路,这种改革模式有助于各市场主体适应制度规则的转变,但也导致不同领域的市场化速度存在区别。因此,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国家为探讨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地区创业活动的关系提供了合适的研究环境。

(二) 假设提出

1. 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地区创业活动

创业是创业者识别和开发机会并实现价值创造的过程(Ardichvili et al., 2003; Bhawe, 1994; 张玉利, 2010)。在该过程中,创业者需要不断与其所处的环境发生互动,并获取信息及相关资源,以评估潜在创业机会的收益和成本(Ardichvili et al., 2003)。制度环境特征通过影响创业者对潜在创业机会的成本收益的评估,影响其创业决策,进而塑造整个区域内的创业活动。

本文认为,制度发展同步性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两种同时存在且方向相反的效应:成本效应和机会效应。从成本效应的角度来看,制度发展同步性较低(制度发展不同步)会增强制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导致创业企业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以应对这样的制度环境。即便个体能够识别出潜在的创业机会,这些高昂的成本也会令其望而却步。从机会效应的角度来看,制度发展同步性较低也可能在各制度维度之间产生潜在的套利空间,这使得个体有机会通过利用这些套利空间来开展创业活动。这两种效应的具体作用逻辑如下:

一方面,制度发展不同步可能会增加创业成本,从而抑制创业活动。首先,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通常需要依靠直觉进行决策(Busenitz & Barney, 1997; Akinci & Sadler-Smith, 2012),

并通过综合比较当前收集到的信息与已有的知识,形成对未来的预期(Wood et al., 2014)。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外部制度因素的影响(Ardichvili et al., 2003)。制度发展不同步同时包含着动态和多元两方面的特征,两者均会增加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制度发展不同步意味着某些制度维度的快速变化,这种易变性降低了创业者原有知识积累的可用性(Boisot & Child, 1999),让他们难以运用已有的知识准确理解制度变化的信号,导致其现有能力无法为新环境下的行动提供指引(王博和朱沆, 2020)。同时,制度发展不同步产生的复杂性会导致创业者从各方面接收到的信息含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使他们无法对创业活动形成清晰的预期(杨震宁等, 2013)。例如,产品市场的快速市场化有助于创业者识别潜在的创业机会,但创业活动还离不开其他制度维度的支持,它们包括且不限于: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合同履行的相关法规和提供法律、税务等服务的第三方机构等(蔡莉和单标安, 2013)。若这些支持性制度发展速度缓慢,则很可能出现初创企业保护创新成果困难、维权成本过高的问题,使创业者难以确定其能否有效地利用识别到的创业机会。因此,制度发展不同步会增加创业者对创业活动前景的感知不确定性,从而抑制创业活动。

其次,制度发展不同步会提高企业的交易和运作成本。制度是多个子制度维度共同组成的体系(Acemoglu & Johnson, 2005; Marquis & Raynard, 2015),不同制度维度分别有不同的运行逻辑,规定了行动者应该实现什么目标,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该目标的制度要求(Pache & Santos, 2010)。制度发展不同步则往

往意味着存在混乱甚至冲突的制度要求,制度维度之间发生摩擦。潜在创业者若想遵从其中某项制度要求,则可能需要挑战另一项制度要求,这会大幅增加他们获取合法性的难度,更难以获取资源、达成交易(陆亚东, 2015)。例如,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早期阶段,产品市场的快速改革催生出大量的创业企业,然而金融市场的改革则相对滞后,这使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林毅夫和李永军, 2001; 朱武祥等, 2020)。为了筹集经营所需的资金,创业者不得不依靠地缘、亲缘和血缘关系等途径集资,但这种做法又面临较高的法律风险。同时,不同步的制度发展还可能导致多种潜在冲突的规则在同一个制度环境之中共存,使得创业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分别在不同的规则框架下开展行动。此时,创业者需要面对多种不兼容的规则和要求,这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认知压力,并使其在处理与制度环境中其他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时面临更多困难(Boisot & Child, 1999; Child & Rodrigues, 2011)。因此在互动过程中,交易双方难免会出现争议并面临更高的成本(Bylund & McCaffrey, 2017)。这些问题都会增加创业企业在制度发展同步性较低的环境中开展商业活动的交易成本和运作成本。与成熟企业相比,创业企业的劣势在于缺少必要的资源缓冲(朱沆和徐鸿昭, 2020),这使制度发展不同步带来的高成本可能会产生更强的负面影响。因此,制度发展越不同步,创业企业面临的生存挑战便越大,更多的潜在创业者会由此受到阻遏,导致新生企业的数量减少。

另一方面,制度发展不同步也可能带来创业机会,从而刺激创业活动。正如前文所述,

制度发展不同步意味着子制度维度的发展速度不一致,从而出现不同子制度维度所遵循的逻辑难以相互匹配的情况。这种不匹配虽然会增加创业成本,但也为潜在创业者进行制度套利提供了机会,即创业者可以在由不同逻辑主导的制度维度之间开展套利活动获取收益(Perkmann et al., 2022)。这是由于每种制度逻辑都定义了一系列社会活动结果所对应的价值,并相应地规定了适合于实现这些结果的实践(Thornton et al., 2012; Brandtner, 2017)。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异质性既塑造了差异化的实践,也导致对同一活动的差异化估值(Thornton et al., 2012),使资源不均匀地分布在由不同逻辑主导的制度维度之间,即一种特定资源可能在某一个制度维度相对丰富,但在另一个制度维度却十分稀缺(Perkmann et al., 2022)。此时,不同制度维度之间资源价值的差异将导致市场中产生潜在的、未被满足的需求,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机会。例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线上交易的渗透,我国的线上产品市场借此实现了高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以银行为核心的支付体系却仍按原有的模式运行,难以满足线上交易支付担保的需求。一些企业识别到这一潜在的机会,并抓住该机会迅速进入市场,取得了较好的绩效。此外,制度创业的相关研究也指出,当某项制度的发展相对滞后并给市场参与主体带来不便时,各参与主体往往会对能够缓解不便的方案产生迫切需求,这给制度创业者开展制度创业以填补制度空缺提供了机会(Matsunaga et al., 2010)。

但是,制度套利的结果通常具有不确定性,行动者在套利过程中需要面临较高的风险

(Perkmann et al., 2022)。因此,只有当创业者认为套利机会的价值具有足够吸引力时,他们才会采取行动。具体而言,制度套利需要组合不同的制度逻辑,因此各制度维度运行逻辑之间的兼容程度是影响套利风险和机会价值的重要因素(Perkmann et al., 2022)。若不同制度维度的运行逻辑相互匹配,虽然创业者开展套利活动所面临的挑战较小(Greenwood et al., 2011),需要承担的套利风险更低,但与之对应的套利收益也相对有限,因此吸引力较弱。相反,创业者将两种甚至多种匹配程度较低的逻辑进行组合的难度通常较大,但其能够获取的收益也往往更高。这意味着,随着制度发展不同步程度的增加,不同制度维度间运行逻辑的兼容性下降,制度套利的空间和相应收益会明显提升。不可忽视的是,虽然制度套利机会的价值会随着制度发展不同步程度的提升而逐渐凸显,但是创业活动依旧会受到复杂制度环境的制约。创业领域的相关研究则指出,面对发展高度不同步的制度环境,创业者在开发创业机会的过程中可以运用适当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制度产生的束缚(Elert & Henrekson, 2016; Bylund & McCaffrey, 2017)。例如, Uber 在建立时便将自己定义为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客运服务公司,以此来规避出租车行业相关规定的限制。因此,只有当制度发展不同步程度足够高时,其释放的创业机会才可能被认为是 有价值的,才能发挥刺激创业活动的作用。

综上所述,当制度发展更同步时,各制度维度的发展速度相对匹配,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的成本较低,地区创业活动活跃。随着制度发展不同步的增加,由易变性和复杂性带来的

成本效应开始导致较多创业者裹足不前。此时,虽然制度套利空间开始显现,但其收益还不足以对较多创业者产生吸引力。因此,成本效应在该阶段占据主导作用,制度发展不同步产生的挑战呈现非线性增加,该地区内的创业活动随之迅速下降。然而,随着制度发展不同步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发展滞后的子制度维度与发展较快的子制度维度之间的差距逐渐增大,这使其中所蕴含的套利机会的价值不断提升,产生的边际吸引力越来越强,而随之增加的边际成本则越来越小。当制度发展不同步程度跨过某个阈值时,套利机会便会对潜在创业者产生很强的吸引力,并激励他们采取行动。此时,制度发展不同步的机会效应开始抵消成本效应产生的负面影响,地区内的创业活动随制度发展不同步程度的进一步增加而出现小幅度的回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地区创业活动之间存在“U”形关系,即随着制度发展趋向于不同步,地区创业活动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

2. 不确定性规避和未来导向文化的调节作用

创业活动不仅取决于创业者嵌入的正式制度环境,也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Chowdhury et al., 2019)。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能够通过社会化过程内化为个体的观念,进而影响创业者对外部环境的认知。考虑到制度发展不同步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本效应和机会效应的共同作用,本文主要关注与创业成本和创业机会价值高度相关的两个文化因素:不确定性规避和未来导向。其中,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描述了某一地区内个体对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事物的厌恶程度 (Hofstede, 2001),它会影

响潜在创业者对制度环境以及创业过程中所包含不确定性的态度,从而作用于他们对创业成本的感知 (Li & Zahra, 2012)。未来导向文化则反映了某一地区内个体对于未来和现在的关注程度,能够影响潜在创业者对创业机会价值的感知 (赵向阳等, 2012)。

(1) 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调节作用。在面对不确定性的环境时,人们往往会感受到威胁,但不同地区的个体感受的威胁程度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在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个体会更加厌恶不确定性,并对开展创业活动等冒险行为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Li & Zahra, 2012)。而在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不确定性则更容易被个体所接受 (Mueller & Thomas, 2001; Li et al., 2013)。这种文化倾向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地区的创业者对制度发展同步性的影响做出不同反应。

对处于高不确定性规避地区的创业者而言,制度发展不同步对创业活动的抑制作用可能更强。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意味着社会中的个体更加追求有序 (Orderliness) 和一致性 (Consistency),并希望借助正式规则或法律等来减少生活中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 (Autio et al., 2013)。现有研究表明,高不确定性规避的个体往往更关注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并倾向于高估创业的潜在风险 (Wennekers et al., 2007)。发展不同步的制度环境带来的易变性和复杂性会产生较高的不确定性,导致处于高不确定性规避地区的潜在创业者高估创业成本和失败概率,从而阻碍了他们开展创业活动。同时,制度发展不同步程度的增加虽然能够带来制度套利的机会,但在匹配程度较低、运行逻辑相差较大的制度之间套利时,行动者的合法性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挑战,

这令套利结果更加难以预测 (Perkmann et al., 2022)。此时,高不确定性规避的个体会更多关注制度套利的困难和成本,这使他们即便面对具有潜力的制度套利机会时也更趋于谨慎。

与之相反,处在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下的个体则较多关注环境中潜在的机会而不是损失。因此,在制度套利空间迅速增大的情况下,此类潜在创业者更有可能选择性地忽视复杂制度环境带来的成本,并受机会吸引而迅速采取行动。

综上所述,在成本效应发挥主导作用的阶段,制度发展不同步程度的提升会对高不确定性规避地区的个体产生更强烈的负面影响,这导致此类地区的创业活动受到更严重的抑制。

而后,当制度发展不同步程度超过特定阈值时,制度环境中的套利机会的价值迅速提升。但是,高不确定性规避地区的创业者往往要等待制度发展不同程度达到更高水平、套利空间更大时才会采取行动。因此,从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地区创业活动之间的曲线关系来看,这将可能导致曲线的极值点在更高的制度发展不同步程度下才会出现。此外,当曲线越过极值点后,在相同条件下,不确定性规避水平更高(相较于更低)的地区的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的可能性更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 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能够调节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地区创业活动之间的“U”形关系。具体而言,对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较强的地区,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地区创业活动之间的“U”形关系更明显。

(2) 未来导向文化的调节作用。未来导向文化反映的是该地区的人们愿意做出为未来做计划、投资未来和延迟享受等未来导向行为的

程度 (House et al., 2002; 刘霞等, 2010)。它不仅强调了人们对时间和不确定性的态度,还反映了个体管理未来和应对威胁事件的能力以及做出的相关努力。

对于身处高未来导向地区的个体,他们在面对制度发展不同步程度高的制度环境时,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小。心理学研究表明,未来导向会引导个体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中思考未来 (Tucker et al., 2013; Gan et al., 2017),并更多地关注长期目标的潜在增长和收益,而不是潜在的威胁和损失,这提高了个体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 (Zheng et al., 2021)。因此,受高未来导向文化影响的个体能够跳出当前复杂的制度环境,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创业活动的潜在机会,并愿意积极地为未来做规划。

与之相反,处于低未来导向地区的个体往往更关注当下的生活。若外部环境趋于不确定,他们通常会为当前的事务分配更多的资源和时间,并减少从事创业活动等投资未来的行为。面对制度发展不同步产生的制度套利机会,受低未来导向文化影响的个体通常更看重当前的成本和收益,由此赋予未来收益较高的折现率 (Srivisal et al., 2021),这导致他们与高未来导向的个体相比往往会对制度套利产生的创业机会给出更低的估值,也更可能放弃行动。

综上所述,高未来导向的地区文化能够缓冲制度发展不同步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冲击。具体而言,随着制度发展不同步水平增加,不确定性的负面效应逐渐增强。由于高未来导向的缓冲作用,此类地区的创业活动在相同制度发展不同步水平下相较于其他地区受到的抑制更少。随着制度发展不同步程度超过特定阈值,

制度套利的机会效应逐渐开始发挥作用。在该阶段，高未来导向地区的创业者能够更迅速地识别潜在的制度套利机会，并更重视这些机会可能带来的收益，从而积极采取行动。从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地区创业活动之间的曲线关系来看，该效应会导致曲线的极值点在更低的制度发展不同步水平下出现。基于上述分析，本文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未来导向文化能够调节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地区创业活动之间的“U”形关系。具体而言，对于未来导向文化较强的地区，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地区创业活动之间的“U”形关系更不明显。

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归纳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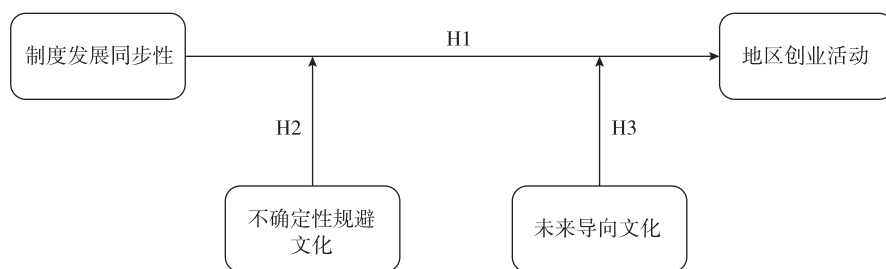


图1 本文研究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

本文使用的创业数据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制度数据来源于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分省份市场化指数（以下简称“市场化指数”），其余地区层面变量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赵向阳等（2015）的研究。

创立企业是创业者参与市场交易、谋求价值创造的里程碑事件。同时，当年地区内新增企业数量能够较好地反映出当地创业活动的情况（谢绚丽等，2018），也是地区经济活力的重要表现。因此，本文采用一个地区内当年新增企业的数量来反映该地区的创业活动水平。我们的数据基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该系统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办的官方企业

数据公开平台，能够提供各地区各年的各类企业的新增数量，帮助我们更全面地刻画地区内企业的新增情况。近年来，该平台数据已被学者们广泛应用于创业研究（赵涛等，2020；Lei et al.，2021；莫怡青和李力行，2022）。

然后，我们构造了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即制度发展同步性。基于相关研究的惯例（Shi et al.，2017；Chan & Du，2021）。本文结合市场化指数以及熵公式构造了“制度发展不同步”变量，来刻画一个地区的制度发展同步性。市场化指数主要涉及与市场制度相关的五个维度，包含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商品和要素市场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和法律体系完善程度（王小鲁等，2017）。它能够反映各省份市场交易机制的完善程度以及制度的多维性特征，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有关国内市场制度的研究中（李维安等，2015；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Shi et al.，2017）。同时，该指标体系提供了各维度

的分项得分数据,使本文得以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反映制度变迁的多维性和动态性的制度指标。

以纸质报告形式出版的市场化指数自 2008 年起修改了计算方法,且 2015 年并未披露分项得分数据。受限于此,该版本的数据仅能用于探究 2008~2014 年的创业活动。因此,本文使用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发布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数据^①,该版本指数更适合时间跨度较长的样本数据的分析,且满足横向以及纵向层面具有可比性的要求。同时,在构建制度发展不同步的测量时,我们需要计算制度发展速度,因此变量的首期不能被纳入样本之中。在考虑关键变量数据的可获得性后,本文最终将研究的时间区间选定为 2004~2019 年。经过上述处理并剔除存在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我们最终得到由 2004~2019 年 280 个城市共 4043 个观测值构成的市级样本数据集。

(二) 变量与测量

1. 因变量:地区创业活动

本文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获取了 2004~2019 年逐年、各市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独资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以及私营企业六种类型企业的新增数量,并参照已有研究的通常做法 (Liu & Shao, 2022; Wei, 2022),计算这六种类型企业的新增数量总和加 1 后取对数作为该地区创业活动的测量。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还尝试使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Zhang, 2019)中的“新建企业进入”分项指数得分作为地区创业活动的测量,

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2. 自变量:制度发展不同步

本文参照 Shi 等 (2017) 的做法,使用市场化指数来构造各省份制度发展不同步的测量。本文首先计算样本中 i 省的市场化指数中分项指数 j 在 $t-1$ 到 t 时间段内的绝对变化速度:

$$\Delta Subindex_{ijt} = |Subindex_{ijt} - Subindex_{ijt-1}| \quad (1)$$

式 (1) 中, $\Delta Subindex_{ijt}$ 表示 t 年 i 省的市场化指数中分项指数 j 相较于 $t-1$ 年的变化值。而后,计算每个分项指数 j 的绝对变化速度与五个分项指数整体的绝对变化速度的比值,从而对每个分项指数的绝对变化速度进行归一化处理以满足式 (3) 的要求:

$$\Delta ZSubindex_{ijt} = \frac{\Delta Subindex_{ijt}}{\sum_{j=1}^5 \Delta Subindex_{ijt}} \quad (2)$$

式 (2) 中, $\Delta ZSubindex_{ijt}$ 表示经过归一化后的 t 年 i 省的市场化指数中分项指数 j 变化值。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熵公式 (Entropy Formula) 的性质,当一组和为 1 的数据差异越小时,该公式计算结果越大。因此,本文运用熵公式 (3) 来计算出市场化指数的五个分项指标发展的同步程度,而后使用式 (4) 计算得到 i 省在 t 年的制度发展不同步得分:

$$Balance_{it} = \sum_{j=1}^5 \Delta ZSubindex_{ijt} \times \ln\left(\frac{1}{\Delta ZSubindex_{ijt}}\right) \quad (3)$$

$$Unbalance_{it} = \max_t - Balance_{it} \quad (4)$$

式 (3) 中, $Balance_{it}$ 表示 t 年 i 省的制度

^① 该版本市场化指数的相关数据以及变量构造说明详见: <https://cmi.ssap.com.cn/>。

发展同步程度；式（4）中， $\max_t$ 表示 t 年所有省通过熵公式计算得到的制度发展同步程度的最大值； $Unbalance_{it}$ 表示 t 年 i 省的制度发展不同步程度。当制度发展不同步的测量指标得分越高时，表明该省的制度各组成维度之间发展越不同步，即制度发展同步性较低。

3. 调节变量

本文使用的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和未来导向文化的测量指标均来源于赵向阳等（2015）构建的中国区域文化习俗指数，该指数已被学者们广泛应用于相似主题的研究中（刘威和黄晓琪，2019；杨昊等，2019；王晗等，2022）。在赵向阳等（2015）的研究中，他们参考 GLOBE 量表，将对应题项翻译为中文后以中国各省份的大学本科新生为样本开展数据收集，测算出中国各省市的数个重要文化维度。详细抽样方法及测量量表可参见赵向阳等（2015）。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和未来导向文化的取值范围为 1~7，取值越大则说明本区域该文化维度的水平越高。

4. 控制变量

为分离核心变量的效应，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地区创业活动的一系列宏观变量。首先，由于本文关注制度发展同步性产生的影响，我

们在模型中控制了常用的制度环境变量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即制度发展水平、制度水平不同步和制度发展速度（Banalieva et al.，2018）。其次，现有文献发现，地区创业活动受到当地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的重要影响。因此，本文控制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失业率、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存款余额占比以及房价（吴晓瑜等，2014；谢绚丽等，2018）。因为在城市层面的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所以本文在模型中使用省级层面变量作为替代测量。同时，本文还在模型中纳入了普通高等院校数量以控制地区教育和创新水平。此外，风险投资的投资活动能够在当地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Schnitzer & Watzinger，2020），从而激发创业活力。因此，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当地的风险投资可得性。为了减轻内生性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所有控制变量均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最后，本文在每个模型中均添加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这有助于控制研究时间窗口期内的经济周期变化，并减少可能与特定城市固有特征相关的遗漏变量误差。变量详细测量说明如表 2 所示。

表 2 主要变量名称及测量

	变量名称	测量方式	数据来源
因变量	地区创业活动	$\text{Log}(1 + \text{当年该市新增企业数量})$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自变量	制度发展不同步	参照文中式（1）~式（4）	市场化指数
调节变量	不确定性规避	GLOBE 问卷对应题项，详见赵向阳等（2015）	赵向阳等（2015）
	未来导向	GLOBE 问卷对应题项，详见赵向阳等（2015）	
控制变量	制度水平不同步	参照文中式（2）~式（4）	市场化指数
	制度发展速度	$(\text{地区当年市场化指数得分} - \text{上年度市场化指数得分}) / \text{上一年市场化指数得分}$	
	制度水平	各省份市场化指数总分	

续表

	变量名称	测量方式	数据来源
控制变量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Log (1+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
	人口	Log (1+年末常住人口)	
	失业率	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 由《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直接提供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	
	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	
	风险投资可得性	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中的“VCPE 投资项目数量”分项指标得分	
	存款余额占比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	
	房价	Log (1+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	
	普通高等院校数量	Log (1+普通高等院校数量)	

(三) 描述性统计

表 3 呈现了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4 汇报了核心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由此可见, 相关变量的取值均在正常范围之内, 不存在明显异常值的情况。在 4043 个样本中, 地区

创业活动变量的均值为 8.249, 标准差为 1.179, 表明我国各市的创业活跃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同时, 制度发展不同步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也意味着我国各省份的制度各维度发展的不同步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表 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地区创业活动	4043	8.249	1.179	5.529	12.850
制度发展不同步	4043	0.399	0.206	0.000	1.088
不确定性规避	4043	4.341	0.100	4.150	4.560
未来导向	4043	4.234	0.097	4.040	4.390
制度水平不同步	4043	0.035	0.036	0.000	0.252
制度发展速度	4043	0.032	0.062	-0.178	0.265
制度水平	4043	7.435	1.670	2.470	11.080
人均生产总值	4043	10.120	0.820	4.605	13.056
人口	4043	5.872	0.638	2.975	7.298
失业率	4043	3.593	0.633	1.700	6.500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4043	37.318	8.472	11.050	77.540
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4043	48.247	10.651	14.950	85.920
风险投资可得性	4043	5.155	2.868	0.034	10.000
存款余额占比	4043	1.235	0.510	0.245	4.070
房价	4043	4.175	2.334	0.964	15.242
普通高等院校数量	4043	1.596	0.853	0.693	4.443

表 4 主要变量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 地区创业活动	1															
(2) 制度发展不同步	0.127	1														
(3) 不确定性规避	0.204	0.035	1													
(4) 未来导向	0.029	0.068	0.320	1												
(5) 制度水平不同步	-0.379	-0.203	-0.176	0.013	1											
(6) 制度发展速度	-0.145	-0.137	-0.008	-0.002	0.126	1										
(7) 制度水平	0.524	0.252	0.363	0.197	-0.684	-0.371	1									
(8) 人均生产总值	0.685	0.273	0.163	0.000	-0.416	-0.270	0.537	1								
(9) 人口	0.497	0.012	0.103	0.038	-0.199	-0.011	0.231	-0.080	1							
(10) 失业率	-0.349	-0.161	-0.245	-0.298	0.190	0.111	-0.388	-0.358	-0.053	1						
(11)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0.483	0.048	0.009	0.116	-0.027	-0.082	0.166	0.262	0.082	-0.181	1					
(12) 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0.063	0.063	0.090	-0.076	-0.170	-0.042	0.127	0.380	-0.123	-0.079	-0.596	1				
(13) 风险投资可得性	0.536	0.022	0.198	0.004	-0.157	-0.036	0.259	0.359	0.275	-0.081	0.299	0.122	1			
(14) 存款余额占比	0.432	0.046	-0.193	-0.095	-0.020	-0.046	-0.011	0.216	0.000	-0.157	0.640	-0.274	0.248	1		
(15) 房价	0.560	0.302	0.141	0.088	-0.460	-0.239	0.715	0.635	0.049	-0.530	0.364	-0.018	0.156	0.279	1	
(16) 普通高等院校数量	0.692	0.039	0.076	0.012	-0.103	-0.044	0.154	0.425	0.431	-0.040	0.465	0.009	0.593	0.467	0.121	1

四、实证检验

(一) 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对研究模型的系数进行统计估计。实证检验思路如下：模型 1 为仅纳入控制变量的基准回归模型；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制度发展不同步的测量变量，检验制度发展不同步与地区创业活动之间的线性关系；模型 3 进一步地加入制度发展不同步的二次项，以此检验制度发展不同步与地区创业活动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假设 1），我们期望制度发展不同步的二次项系数为正且统

计显著；模型 4 通过在模型中同时添加制度发展不同步的二次项及一次项与不确定性规避的交互项，检验了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调节作用；模型 5 则包含制度发展不同步的二次项及一次项与未来导向的交互项，以此检验未来导向文化的调节作用。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确定性规避和未来导向这两个文化变量在省级层面的逐年取值均为固定值，在探究其调节效应时，若研究模型中添加城市固定效应，则已经可以控制这两个变量自身对因变量（地区创业活动）产生的直接影响，无须在模型中额外单独添加这两个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制度发展不同步与地区创业活动的主效应及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制度发展不同步 ²			0.172 *** (0.062)	10.559 ** (4.231)	11.640 *** (2.784)
制度发展不同步		-0.086 *** (0.023)	-0.252 *** (0.065)	-6.681 (4.099)	-15.108 *** (2.680)
制度发展不同步 ² × 不确定性规避				-2.395 ** (0.977)	
制度发展不同步× 不确定性规避				1.483 (0.946)	
制度发展不同步 ² × 未来导向					-2.709 *** (0.652)
制度发展不同步× 未来导向					3.512 *** (0.629)
制度水平不同步	-0.969 *** (0.282)	-0.910 *** (0.285)	-0.914 *** (0.286)	-0.974 *** (0.287)	-0.860 *** (0.283)
制度发展速度	0.246 *** (0.094)	0.259 *** (0.093)	0.264 *** (0.093)	0.239 ** (0.094)	0.308 *** (0.094)
制度水平	0.023 (0.020)	0.024 (0.020)	0.027 (0.020)	0.027 (0.020)	0.029 (0.020)
人均生产总值	0.135 ** (0.062)	0.139 ** (0.062)	0.142 ** (0.062)	0.137 ** (0.062)	0.152 ** (0.064)

续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人口	0.758*** (0.195)	0.757*** (0.194)	0.766*** (0.195)	0.753*** (0.193)	0.739*** (0.193)
失业率	-0.009 (0.018)	-0.008 (0.018)	-0.009 (0.018)	-0.007 (0.018)	-0.009 (0.018)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0.023*** (0.003)	0.023*** (0.003)	0.023*** (0.003)	0.023*** (0.003)	0.022*** (0.003)
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0.020*** (0.003)	0.020*** (0.003)	0.020*** (0.003)	0.020*** (0.003)	0.020*** (0.003)
风险投资可得性	0.005** (0.002)	0.004** (0.002)	0.004** (0.002)	0.004** (0.002)	0.004* (0.002)
存款余额占比	0.135*** (0.050)	0.134*** (0.050)	0.135*** (0.049)	0.136*** (0.049)	0.144*** (0.049)
房价	-0.012 (0.009)	-0.013 (0.010)	-0.014 (0.010)	-0.012 (0.010)	-0.012 (0.010)
普通高等院校数量	-0.051 (0.032)	-0.050 (0.032)	-0.051 (0.032)	-0.053 (0.032)	-0.051 (0.032)
常数项	-0.877 (0.964)	-0.897 (0.967)	-0.956 (0.967)	-0.867 (0.963)	-0.870 (0.971)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N	4043	4043	4043	4043	4043
调整 R ²	0.970	0.970	0.970	0.970	0.971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市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p<0.1，** p<0.05，*** p<0.01。

表 5 中模型 2 在仅包含制度发展不同步变量的一次项时，该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 ($Beta = -0.086$, $p < 0.01$)。同时，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影响对核心变量的估计，我们进一步计算了制度发展不同步变量的 VIF 值，结果为 1.94，小于阈值 10。这表明，模型因多重共线性问题而导致核心变量回归系数出现偏误的可能性较低。表 5 中模型 3 直接检验了制度发展不同步对地区创业活动的主效应。结果表明，制度发展不同步的二次项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Beta = 0.172$, $p < 0.01$)，

这为制度发展不同步与地区创业活动之间可能存在“U”形关系提供了初步证据。考虑到仅通过自变量二次项系数的显著性来判断函数曲线形状的做法存在误判的可能性，我们遵循 Haans 等（2016）的建议，使用 Stata 的“u-test”命令检验该曲线是否可以取得极值点。检验结果在 10% ($p = 0.062$)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两者关系是线性或倒“U”形曲线的原假设，表明该曲线关系可在样本数据的取值区间内经过其极值点，且呈现为“U”形曲线。同时，我们还绘制了制度发展不同步对地区创业

活动的边际效应图,如图2所示。可以发现,在达到极值点之前,随着制度发展不同步的增加,地区创业活动不断减弱,而在达到极值点之后,制度发展不同步对地区创业活动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地区创业的活跃程度逐步回升。以上结果均支持假设1。

本文进一步检验调节效应。鉴于“U”形曲线的特殊性,直接观察交互项的系数可能不能准确判断调节变量产生的具体作用效果。因此,我们参考 Haans 等(2016)的做法,分别从曲线陡峭程度以及极值点移动方向两个方面分析调节变量对主效应产生的影响(具体的检验说明见文后注释①)。首先,对于不确定性规避的调节效应。表5中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不确定性规避与制度发展不同步的二次项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为负,且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Beta=-2.395$, $p<0.05$),这表明高不确定性规避会让曲线变得更加平缓。同时,关于极值点移动方向的统计量取值为0.343,在1%水平上($p=0.008$)拒绝了该统计量与0没有差异的原假设,说明高不确定性规避会让曲线的顶点向右移动。

其次,对于未来导向的调节效应。模型5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制度发展不同步的二次项与未来导向的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Beta=-2.709$, $p<0.01$),这意味着高未来导向会让曲线变得更加平缓。关于极值点移动方向的统计量取值为0.048,但并未能拒绝该统计量与0没有差异的原假设($p=0.577$),即未发现高未来导向会让曲线的顶点发生移动的实证证据。图3和图4分别直观地呈现了上述结果。其中,观察图3可以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对应的曲线的极值点明显向右发生了移动。同时,两条曲线在制度发展不同步由低升高的阶段存在一部分高度接近的区域(该部分曲线的置信区间高度重合),这可能是因为只有当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对潜在创业者才会产生影响,即在制度发展的不同步程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也较低,此时高不确定性规避地区与低不确定性规避地区的潜在创业者受制度发展同步性的影响程度的差异相对较小。在图4中,高未来导向对应的曲线明显比低未来导向的曲线更加平缓。因此,假设2和假设3得到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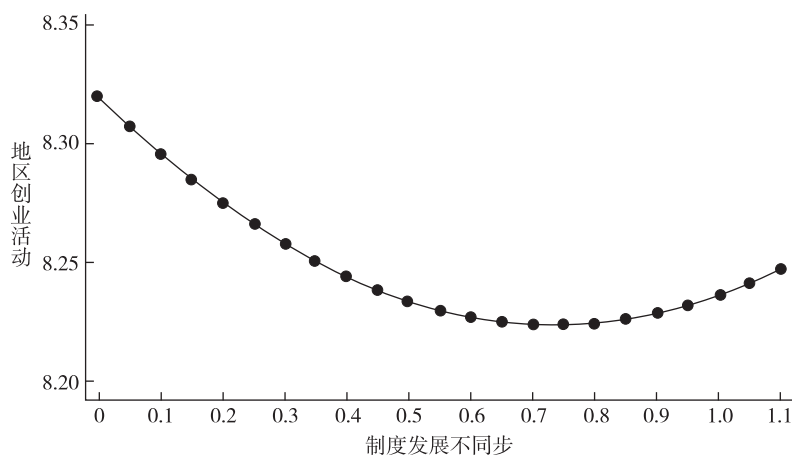


图2 制度发展不同步与地区创业活动之间的“U”形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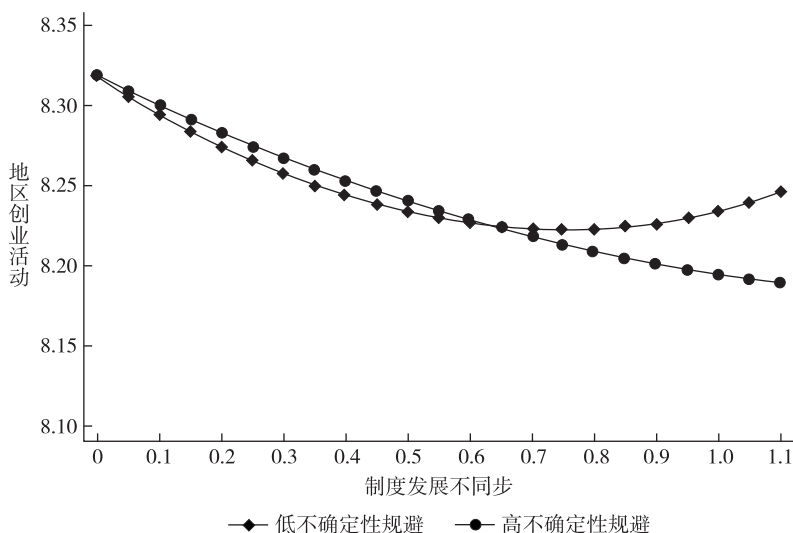


图3 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调节效应

注：图中低不确定性规避和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曲线分别根据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取得均值及距离均值正一个标准差位置的数值时的情况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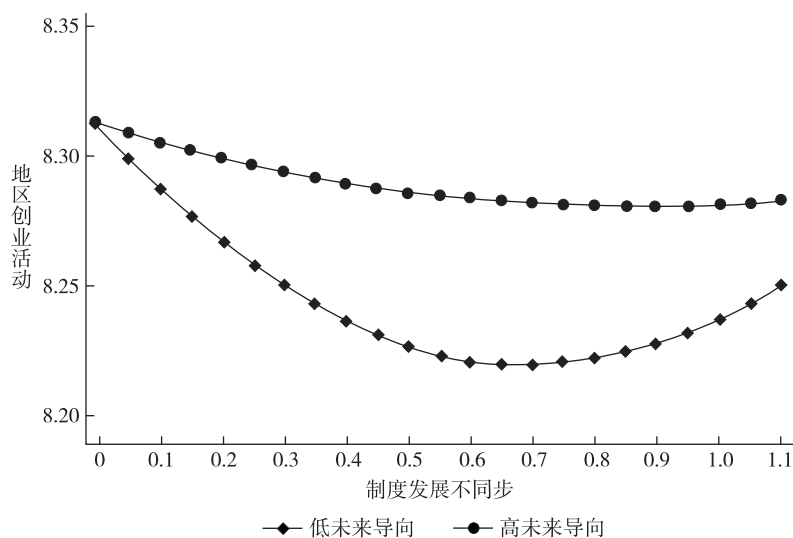


图4 未来导向文化的调节效应

注：图中低未来导向和高未来导向的曲线分别根据未来导向程度取得均值及距离均值正一个标准差位置的数值时的情况绘制。

(二) 稳健性检验

首先，构建制度发展不同步这一变量的具体测量是本文实证研究部分的核心之一。考虑到在计算数据一致性时使用到的算法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指标的最终取值，且现有研究中还

存在其他与之类似的算法。因此，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尝试使用泰尔指数即式(5)的计算方法替换前文提及的熵公式即式(3)，而其余计算步骤均与前文保持一致，以此重新构造制度发展同步性的度量方式。实证检验结

果如表 6 中的模型 1 至模型 3 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 制度发展不同步的二次项系数为正, 这与前文的发现一致, 且同样具有统计显著性, 说明实证分析结果相对稳健。

$$Balance_{it} = \sum_{j=1}^5 \frac{\Delta ZSubindex_{ijt}}{Mean_{it}} \times \ln\left(\frac{\Delta ZSubindex_{ijt}}{Mean_{it}}\right) \quad (5)$$

式 (5) 中, $\Delta ZSubindex_{ijt}$ 表示经过归一化后的 t 年 i 省的市场化指数中分项指数 j 的变化值; $Mean_{it}$ 表示 t 年 i 省的市场化指数中分项指数的平均值。

其次, 由于制度发展与制度倒退并不是完全对称的过程, 可能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 (Banalieva et al., 2018), 将它们同时包含在模型中可能导致最终的结论出现偏差。因此, 本文也参照王博和朱沅 (2020) 的做法, 在检验制

度发展不同步的主效应以及相关调节效应时仅使用相较于前一期某地区当期的市场化水平有所提升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即只关注市场化程度实现了进步的样本。相关分析的检验结果如表 6 中模型 4 至模型 6 所示, 结果表明, 核心变量的系数符号与预期一致并具有统计显著性。

最后, 本文使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 并从中提取出“新建企业进入”这一分项指标得分作为地区创业活动的替代测量, 以检验变更因变量的度量方式是否会影响结论的稳定性。检验结果如表 7 模型 1 至模型 3 所示, 制度发展同步性的二次项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其他回归系数的方向也与前文一致且统计显著, 表明本文的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

表 6 自变量的替代测量及子样本检验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制度发展不同步 ²	0.172 *** (0.062)	10.559 ** (4.231)	11.640 *** (2.784)	0.216 *** (0.074)	15.476 *** (5.154)	10.629 *** (3.478)
制度发展不同步	-0.258 *** (0.067)	-7.036 * (4.237)	-15.499 *** (2.770)	-0.295 *** (0.078)	-10.854 ** (4.852)	-13.500 *** (3.379)
制度发展不同步 ² × 不确定性规避		-2.395 ** (0.977)			-3.518 *** (1.186)	
制度发展不同步× 不确定性规避		1.563 (0.978)			2.434 ** (1.116)	
制度发展不同步 ² × 未来导向			-2.709 *** (0.652)			-2.459 *** (0.816)
制度发展不同步× 未来导向			3.603 *** (0.650)			3.120 *** (0.794)
制度水平不同步	-0.914 *** (0.286)	-0.974 *** (0.287)	-0.860 *** (0.283)	-1.593 *** (0.403)	-1.741 *** (0.403)	-1.478 *** (0.404)
制度发展速度	0.264 *** (0.093)	0.239 ** (0.094)	0.308 *** (0.094)	0.083 (0.134)	0.073 (0.134)	0.162 (0.132)

续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制度水平	0.027 (0.020)	0.027 (0.020)	0.029 (0.020)	0.028 (0.022)	0.027 (0.022)	0.027 (0.022)
人均生产总值	0.142 ** (0.062)	0.137 ** (0.062)	0.152 ** (0.064)	0.141 * (0.077)	0.128 * (0.076)	0.157 ** (0.077)
人口	0.766 *** (0.195)	0.753 *** (0.193)	0.739 *** (0.193)	0.751 *** (0.203)	0.735 *** (0.203)	0.726 *** (0.201)
失业率	-0.009 (0.018)	-0.007 (0.018)	-0.009 (0.018)	-0.032 (0.020)	-0.029 (0.020)	-0.034 * (0.020)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0.023 *** (0.003)	0.023 *** (0.003)	0.022 *** (0.003)	0.026 *** (0.004)	0.026 *** (0.004)	0.025 *** (0.004)
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0.020 *** (0.003)	0.020 *** (0.003)	0.020 *** (0.003)	0.021 *** (0.003)	0.022 *** (0.003)	0.020 *** (0.003)
风险投资可得性	0.000 ** (0.000)	0.000 ** (0.000)	0.000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存款余额占比	0.135 *** (0.049)	0.136 *** (0.049)	0.144 *** (0.049)	0.120 ** (0.055)	0.119 ** (0.054)	0.125 ** (0.055)
房价	-0.014 (0.010)	-0.012 (0.010)	-0.012 (0.010)	-0.005 (0.010)	-0.003 (0.011)	-0.004 (0.011)
普通高等院校数量	-0.051 (0.032)	-0.053 (0.032)	-0.051 (0.032)	-0.056 (0.034)	-0.057 * (0.034)	-0.057 * (0.034)
常数项	-0.949 (0.967)	-0.862 (0.963)	-0.864 (0.971)	-0.810 (1.058)	-0.653 (1.054)	-0.768 (1.053)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N	4043	4043	4043	2954	2954	2954
调整 R ²	0.970	0.970	0.971	0.971	0.972	0.972

注：括号中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模型 4 至模型 6 仅聚焦于市场化制度水平发生了提升的子样本，因此所含样本数量与前文数据集不同；* p<0.1，** p<0.05，*** p<0.01。

续表

表 7 因变量的替代测量检验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制度发展不同步× 不确定性规避		68.545 ** (27.391)	
制度发展不同步 ²	5.348 *** (1.798)	417.253 *** (124.148)	546.941 *** (101.626)	制度发展不同步 ² × 未来导向			-127.744 *** (23.846)
制度发展不同步	-6.167 *** (1.844)	-303.326 ** (118.928)	-643.821 *** (103.134)	制度发展不同步× 未来导向			150.588 *** (24.274)
制度发展不同步 ² × 不确定性规避		-94.976 *** (28.598)		制度水平不同步	-27.748 *** (8.691)	-30.349 *** (8.879)	-26.422 *** (8.533)

续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制度发展速度	9.427 *** (2.725)	8.426 *** (2.772)	10.608 *** (2.746)
制度水平	1.143 * (0.660)	1.097 * (0.662)	1.202 * (0.658)
人均生产总值	5.491 *** (2.006)	5.302 *** (1.999)	5.831 *** (2.108)
人口	20.262 *** (5.684)	19.865 *** (5.624)	19.224 *** (5.635)
失业率	-0.464 (0.593)	-0.438 (0.596)	-0.496 (0.586)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0.654 *** (0.101)	0.655 *** (0.102)	0.616 *** (0.099)
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0.520 *** (0.093)	0.525 *** (0.093)	0.493 *** (0.091)
风险投资可得性	0.017 ** (0.007)	0.017 ** (0.007)	0.016 ** (0.007)
存款余额占比	2.811 * (1.543)	2.844 * (1.533)	3.147 ** (1.536)
房价	0.074 (0.288)	0.109 (0.293)	0.161 (0.292)
普通高等院校数量	-2.108 * (1.077)	-2.165 ** (1.072)	-2.124 ** (1.063)
常数项	-186.456 *** (32.222)	-183.180 *** (31.951)	-182.671 *** (32.558)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N	4043	4043	4043
调整 R ²	0.945	0.945	0.946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p<0.1，** p<0.05，*** p<0.01。

五、结论与讨论

制度发展同步性会如何影响一个地区的创业活动？本文旨在回应这个问题。通过对我国280个城市2004~2019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130—

分析，本文发现：在控制了制度发展水平、制度发展速度和制度水平同步性的情况下，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地区创业活动之间仍存在“U”形关系；如果该地区文化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弱、未来导向强，那么上述关系则会弱化。

（一）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本文引入制度套利的观点，揭示了制度发展同步性作用的两面性。尽管现有相关研究发现，制度发展不同步对不同企业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但这些研究均主要聚焦于探讨制度发展不同步带来的负面效应，并将其视为不利企业经营的制度环境特征。例如，Chan 和 Du（2021）的研究表明，制度发展不同步会对外资企业子公司的业绩产生消极影响，也会迫使当地企业选择脱离这样的环境走向国际市场（Shi et al.，2017）。立足于制度理论文献新近提出的制度套利观点，本文认为，制度发展不同步在产生不确定性和额外成本的同时，其动态变化和不平衡也会打破原有的制度格局，孕育出制度套利机会，吸引敢于行动的创业者利用这种机会开展创业活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影响将导致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创业活动之间呈现出“U”形关系，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且相关理论假设获得了实证结果的支持。上述发现表明，虽然制度发展不同步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了额外的挑战，但其变化也给创业活动创造了机会。由此，本次研究从创业机会创造角度呈现了制度发展不同步的正面效果，从而丰富了文献对制度发展同步性作用效果的认识。

第二，本文率先考察了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地区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丰富了制度影响创

业的相关研究。以往基于制度视角下的创业研究主要聚焦于制度水平的作用效果，它们倾向于认为，旨在完善正式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能对地区内的创业活动产生积极影响（El-Namaki, 1988; Estrin et al., 2013）。近年来，创业学者也开始尝试从新的视角探讨制度与创业活动的关系。一部分研究基于多元制度视角，探讨多种制度的共同作用（Ault & Spicer, 2020; 杜运周等, 2020）；另一部分研究基于动态制度视角，关注制度的动态变化过程（王博和朱沅, 2020），但上述两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前者虽然考虑了多元的制度维度，但其核心关注点仍然是制度水平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对制度的动态变化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后者则仅关注到制度整体的变化过程，不仅忽视了制度内部多维度的结构特征，也忽视了制度变化过程中不同维度变化速度不一的现实。而本文所采用的制度发展同步性视角则综合了这两种研究观点，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创业活动之间存在“U”形关系。上述发现表明，制度发展的同步性也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宏观变量，这提示未来的创业研究不仅应注意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的成本和挑战，还应当注意它创造的机会。同时，后者也为理解转型经济体国家不完善的商业制度发展状况与其活跃创业活动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解释。

第三，本文将地区文化因素融入制度发展同步性的研究讨论之中，深化了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对创业活动产生作用的认识。已有文献指出，在现实的商业环境中正式制度并非孤立地存在，既有且稳定的非正式制度可以通过塑造价值观念影响正式制度的作用效果

（De Clercq et al., 2013）。然而关于非正式制度如何与动态不平衡的正式制度共同影响创业活动，现有文献仍缺乏相关认识。本文考察了地区层面不确定性规避和未来导向文化对制度发展同步性与地区创业活动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低不确定性规避和高未来导向文化都能促进潜在创业者行动抓住制度套利机会，并弱化制度发展不同步的负面影响。上述发现表明，制度发展不同步的作用更多呈现为消极的成本效应还是积极的机会创造效应，会受到地区文化特征的影响，即只有那些处在不惧不确定、重视未来的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利用和抓住制度发展不同步创造的机会。由此，本文从文化层面充实了对制度发展同步性作用效果的边界条件的认识，同时也丰富了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创业活动的相关文献。

在政策启示方面，本文的发现也为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提供了启示。由于不同领域改革的阻力不同，转型经济体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往往难以实现齐头并进，而是呈现出各子制度维度改革进展速度不一的情况。如何弱化制度发展不同步的负面作用，让改革呈现出更多积极成果，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的结论表明，要削弱制度发展不同步的消极效应，可以从促进创业机会开发的角度入手，即各地方不应过度压制潜在创业者开展制度套利活动，而是要为他们公平利用制度套利机会创造条件。同时，我们的研究也暗示了在具有鼓励创业的文化氛围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的价值，即这些地区促进创业机会开发的文化氛围能够弱化制度发展不同步的潜在负面影响。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有待未来研究探讨和解决。首先，虽然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分省份市场化指数已被学者广泛使用，但其底层计算指标在研究窗口期内发生过更改，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误差。虽然在新版的市场化指数中，开发市场化指数的研究团队针对该问题对其进行了逐年修正，尽可能做到了横向和纵向可比，但是后续研究仍可以尝试开发时间跨度更长、分项指标更精细、不同时间更具可比性的制度评价体系，以获取更准确的研究结论。同时，研究者也可尝试使用国家层面的数据或其他转型经济体的数据进一步探讨本文的理论逻辑。其次，未来研究可以在数据允许的情况下尝试分析制度发展同步性与更多经济后果变量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尝试探究不同的制度变迁模式对创业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Banalieva et al., 2018），从而对制度变迁以及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形成更全面的认识，也能为实践提供更多见解。

注释

①对于如下包含调节效应的“U”形曲线实证模型（自变量为 X ，因变量为 Y ，调节变量为 M ）：

$$Y = \beta_0 + \beta_1 X + \beta_2 X^2 + \beta_3 XM + \beta_4 X^2 M + \beta_5 M$$

对于极值点的移动方向，我们首先需要对上式关于 X 求导并使其取值为0，而后整理出使用 M 来表示 X 的关系式。由于，我们的目的是探究极值点会随着 M 的变化如何变化，因此我们在 M 与 X 的关系式的基础上在对 X 关于 M 求导，得到下式：

$$\frac{\partial X}{\partial M} = \frac{\beta_1 \beta_4 - \beta_2 \beta_3}{2(\beta_2 + \beta_4 M)^2}$$

因为上式中的分母非负，所以我们只需要通过检验 $\beta_1 \beta_4 - \beta_2 \beta_3$ 是否与0有显著差异，便可以判断曲线的极值点是否发生移动。同时，对于“U”形曲线而言，当其取值为正时，则表明随着 M 的增加，极值点将向右移动。Stata中的“nlcom”命令有助于我们实现非线性关系的假设检验。

曲线的陡峭程度只取决于自变量的二次项（ X^2 ）与调节变量（ M ）的交互项（ $X^2 X^M$ ）系数的符号（ β_4 ）。当符号为负且统计显著时，随着 M 的增加，曲线将变得更加平缓。更详细的推导和证明过程可参见Haans等（2016）。

接受编辑：杨俊

收稿日期：2022年9月13日

接受日期：2024年2月20日

作者简介

宋子杰，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创业与风险投资。

黄乐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本科毕业生，研究兴趣为组织理论、全球劳动力市场。

朱沅（通讯作者，E-mail: mnszh@mail.sysu.edu.cn），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为创业与家族企业，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项，与合作者在*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以及《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南开管理评论》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著

作2部。

参考文献

[1] 蔡莉、单标安：《中国情境下的创业研究：回顾与展望》，《管理世界》，2013年第12期。

[2] 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

[3]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2011年第9期。

[4] 贺小刚、朱丽娜、吕斐斐、贾植涵：《创业者缘何退出：制度环境视角的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9年第5期。

[5] 李维安、王鹏程、徐业坤：《慈善捐赠、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资源交换行为》，《南开管理评论》，2015年第1期。

[6] 刘威、黄晓琪：《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地区文化与保险需求》，《金融研究》，2019年第9期。

[7] 刘霞、黄希庭、普彬、毕翠华：《未来取向研究概述》，《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3期。

[8] 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9] 陆亚东：《中国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窘境与未来》，《外国经济与管理》，2015年第3期。

[10] 毛其淋、许家云：《市场化转型、就业动态与中国地区生产率增长》，《管理世界》，2015年第10期。

[11] 莫怡青、李力行：《零工经济对创业的影响——以外卖平台的兴起为例》，《管理世界》，2022年第2期。

[12] 王博、朱沆：《制度改善速度与机会型创业的关系研究》，《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

[13] 王晗、刘慧侠、董建卫：《文化视角下跨境VC对国有联合投资伙伴的选择研究》，《管理评论》，2022年第7期。

[14]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15] 吴晓瑜、王敏、李力行：《中国的高房价是否阻碍了创业？》，《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

[16] 谢绚丽、沈艳、张皓星、郭峰：《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4期。

[17] 谢智敏、王霞、杜运周、谢玲敏：《制度复杂性、创业导向与创新型创业——一个基于跨国案例的组态分析》，《科学学研究》，2022年第5期。

[18] 杨昊、贺小刚、杨婵：《异地创业、家庭支持与经营效率——基于农民创业的经验研究》，《经济管理》，2019年第2期。

[19] 杨震宁、李东红、范黎波：《身陷“盘丝洞”：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影响了创业过程吗？》，《管理世界》，2013年第12期。

[20] 叶文平、李新春、陈强远：《流动人口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与证据》，《经济研究》，2018年第6期。

[21] 张玉利：《创业研究经典文献述评》，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2]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

[23] 赵向阳、李海、Rauch, A.:《创业活动的国家（地区）差异：文化与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管理世界》，2012年第8期。

[24] 赵向阳、李海、孙川：《中国区域文化地图：“大一统”抑或“多元化”？》，《管理世界》，2015年第2期。

[25] 朱沆、徐鸿昭：《市场化速度与私营企业的关系投入——基于动态制度观的实证研究》，《管理学季刊》，2020年第1期。

[26] 朱武祥、张平、李鹏飞、王子阳：《疫情冲

击下中小微企业困境与政策效率提升——基于两次全国问卷调查的分析》，《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27] Acemoglu, D., & Johnson, S. 2005. Unbundling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 949-995.

[28] Akinci, C., & Sadler-Smith, E. 2012. Intuition in management research: A historical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14: 104-122.

[29] Ardichvili, A., Cardozo, R., & Ray, S. 2003. A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8: 105-123.

[30] Ault, J. K., & Spicer, A. 2020. State fragility as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for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and practice. *Asia Pacific Journal Management*, 37: 981-1011.

[31] Ault, J. K. & Spicer, A. 2022. The formal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 A cross-national, configurational-based perspective. *Research Policy*, 51: 104160.

[32] Autio, E., & Acs, Z. 2010.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growth aspiration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4: 234-251.

[33] Autio, E., Pathak, S., & Wennberg, K. 2013. Consequences of cultural practices for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4: 334-362.

[34] Banalieva, E. R., Eddleston, K. A., & Zellweger, T. M. 2015. When do family firms have an advantage in transitioning economies? toward a dynamic institution-based view.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6: 1358-1377.

[35] Banalieva, E. R., Cuervo-Cazurra, A., & Sarathy, R. 2018. Dynamics of pro-market institutions and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9: 858-880.

[36] Bhawe, M. P. 1994. A process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e cre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9: 223-242.

[37] Boisot, M., & Child, J. 1999. Organizations as adaptive systems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The case of China. *Organization Science*, 10: 237-252.

[38] Boudreaux, C. J., & Nikolaev, B. 2019. Capital is not enough: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formal institution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3: 709-738.

[39] Brandtner, C. 2017. Putting the world in orders: Plurality in organizational evalu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35: 200-227.

[40] Bruton, G. D., Ahlstrom, D., & Li, H. 2010.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entrepreneurship: Where are we now and where do we need to move in the futur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4: 421-440.

[41] Busenitz, L. W., & Barney, J. B. 1997. Differences between entrepreneurs and managers in large organizations: Biases and heuristics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2: 9-30.

[42] Bylund, P. L., & McCaffrey, M. 2017. A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stitutional uncertaint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2: 461-475.

[43] Chan, C. M., & Du, J. 2021. The dynamic process of pro-market reforms and foreign affiliate performance: when to seek local, subnational, or global help?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2: 1854-1870.

[44] Child, J., & Rodrigues, S. B. 2011. How organizations engage with external complexity: A political action perspective. *Organization Studies*, 32: 803-824.

[45] Chowdhury, F., Audretsch, D. B., & Belitski, M. 2019. Institu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 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3: 51-81.

[46] Dau, L. A., & Cuervo-Cazurra, A. 2014. To formalize or not to formalize: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market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9: 668-686.

- [47] De Clercq, D. , Lim, D. S. K. , & Oh, C. H. 2013. Individual-level resources and new business activity: The contingent role of institutional context.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7: 303–330.
- [48] El-Namaki, M. S. S. 1988. Encouraging entrepreneu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g Range Planning*, 21: 98–106.
- [49] Elert, N. , & Henrekson, M. 2016. Evasive entrepreneurship.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7: 95–113.
- [50] Estrin, S. , Korosteleva, J. , & Mickiewicz, T. 2013. Which institutions encourage entrepreneurial growth aspira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8: 564–580.
- [51] Fuentelsaz, L. , Garrido, E. , & González, M. 2022. Speed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ubsidiary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impact of home and host country learning.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12: 163–195.
- [52] Gan, Y. , Miao, M. , Zheng, L. , & Liu, H. 2017. Temporal doppler effect and future orientation: Adaptive function and moderating condi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5: 313–325.
- [53] Greenwood, R. , Raynard, M. , Kodeih, F. , Micelotta, E. R. , & Lounsbury, M. 2011.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5: 317–371.
- [54] Haans, R. F. J. , Pieters, C. , & He, Z. -L. 2016. Thinking about U: Theorizing and testing U- and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s in strategy research.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 1177–1195.
- [55] Hofstede, G.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Inc.
- [56] House, R. , Javidan, M. , Hanges, P. , & Dorfman, P. 2002. Understanding cultures and 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ies across the globe: An introduction to project GLOBE.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37: 3–10.
- [57] Lei, D. , Yuan, X. , Li, M. , Ratti, C. , & Liu, Y. 2021. A gridded establishment dataset as a proxy for economic activity in China. *Scientific Data*, 8: 5.
- [58] Li, X. , Cheng, J. , Wan, S. , & Zhao, Z. 2022. Does institutional fragility affect innovation investment?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16: 589–608.
- [59] Li, K. , Griffin, D. , Yue, H. , & Zhao, L. 2013. How does culture influence corporate risk-taking?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3: 1–22.
- [60] Li, Y. , & Zahra S. A. 2012. Formal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venture capital activity: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7: 95–111.
- [61] Liu, P. , & Shao, Y. 2022. Innovation and new business formation: The role of innovative large firm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9: 691–720.
- [62] Marquis, C. , & Raynard, M. 2015. Institutional strategies in emerging marke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9: 291–335.
- [63] Matsunaga, Y. , Yamauchi, N. , & Okuyama, N. 2010. What determines the siz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of the government failure theory. *Voluntas*, 21: 180–201.
- [64] Mueller, S. L. , & Thomas A. S. 2001. Culture and entrepreneurial potential: A nine country study of locus of control and innovativenes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6: 51–75.
- [65]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66] Pache, A. , & Santos, F. 2010. When worlds collide: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conflicting institutional demand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5: 455–476.

- [67] Peng, M. W. , Wang, D. Y. L. , & Jiang, Y. 2008. An institution – 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 focus on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9: 920–936.
- [68] Perkmann, M. , Phillips, N. , & Greenwood, R. 2022. Institutional arbitrage: How actors exploit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Organization Theory*, 3: 1–20.
- [69] Schnitzer, M. , & Watzinger, M. 2020. Measuring the spillovers of venture capital.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04: 276–292.
- [70] Shi, W. S. , Sun, S. L. , Yan, D. , & Zhu, Z. 2017. Institutional fragility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8: 452–476.
- [71] Sine, W. D. , & David, R. J. 2003. Environmental jolt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cre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n the US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Research Policy*, 32: 185–207.
- [72] Shane, S. , & Venkataraman, S. 2000.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 217–226.
- [73] Srivisal, N. , Sanoran, K. L. , & Bukkavesa, K. 2021. National culture and saving: How collectivism, uncertainty avoidance, and future orientation play roles. *Global Finance Journal*, 50: 100670.
- [74] Thornton, P. H. , Ocasio, W. , & Lounsbury, M. 2012.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75] Tucker, R. P. , Wingate, L. R. , O Keefe, V. M. , Mills, A. C. , Rasmussen, K. , Davidson, C. L. , & Grant, D. M. 2013. Ruminat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hope and optimis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5: 606–611.
- [76] Wei, Y. 2022. Regional governments and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in underdevelope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perspective. *Research Policy*, 51: 104380.
- [77] Wennekers, S. , Thurik, R. , van Stel, A. , & Noorderhaven, N. 2007. Uncertainty avoidance and the rate of business ownership across 21 OECD countries, 1976 – 2004.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7: 133–160.
- [78] Wood, M. S. , Mckelvie, A. , & Haynie, J. M. 2014. Making it personal: Opportunity individuation and the shaping of opportunity belief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9: 252–272.
- [79] Xu, D. , & Meyer, K. E. 2013. Linking theory and context: “Strategy research in emerging economies” after Wright et al. (2005) .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50: 1322–1346.
- [80] Zhang, X. 2019. China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dex. Peking University Open Research Data Platform, V4, <https://doi.org/10.18170/DVN/PEFDAS>.
- [81] Zheng, L. , Chen, Y. , & Gan, Y. 2021. Future orientation helps regulate emotion in the futur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51: 920–926.

Synchron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Zijie Song Lewei Huang Hang Zhu

(School of Business,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crutinizes how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 are influenced by the *synchron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which is defined as the differential speed of reform across various institutional components. Building on the seminal research of Shi and colleagues (2017), scholars have unpacked the critical role of synchron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shaping commercial activities. Specifically, the unsynchron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has been proven to pos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and uncertainties for market entities, resulting in increased transaction costs and operating costs.

Despite substantial progress, existing research has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unsynchronize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verlooking its potential positive outcomes. Scholarly works on institutional theory has indicated that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logics can facilitate organizations to gain from institutional arbitrage across diverse institutional elements. 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ntifying and develop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business modes for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troduce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arbitrage to examine the opportunity creation effect of unsynchron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explore how the dynamic, lopsided change of institutional components link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tart-ups.

We posit that unsynchron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may influenc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via the cost effect and the opportunity creation effect. First, unsynchronize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would intensify conflicts among sub-dimensions of the institution, which may result in a decrease in start-up establishment. Second, unsynchronize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may also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institutional arbitrage, thus attracting entrepreneurs to engage in entrepreneurship to gain benefits. This is because unsynchronize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would lead to an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cross domains governed by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logics, which could provide entrepreneur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fulfill the unmet market needs. Such two contrasting effects would give rise to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gree of synchron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We also hypothesize that less uncertainty avoidance and more future orientation could mitigate the influence of unsynchronize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nchron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we employ an extensive dataset covering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cross 280 Chinese cities from 2004 to 2019. We capture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by collecting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from the National Enterprise Credit Information Publicity System.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synchron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 we use entropy formula based on the Marketization Index provided by the Chinese 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Region-level variables are mainly drawn from the Urban Statistical Yearbook and the National Statistical Yearbook. We use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s to test our hypothes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robustly support our prediction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existing research at the nexus of institu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irst, we add to this stream of research by elucidating the overlooked positive outcome of unsynchronize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shaping commercial activities, enabl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synchron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Second, despite current studies emphasizing the institutional antecedents of entrepreneurship, scant attention has been directed toward the unbalance natur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how these structural dynamics link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omestic start-ups. The current article addresses this crucial knowledge gap and aligns with persistent calls to examine entrepreneurship in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s, particularly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Third, we also investigate the entrepreneurial consequences by consider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uncertainty avoidance and future orient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ese findings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influence of formal institutions varies across diverse cultural contexts.

Key Words: synchron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dynamic institution-based view;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